



■ 黃曉京

編後記

何維凌（1944年12月25日~1991年6月5日），祖籍廣東中山，生長於上海，求學於北京。在北京大學讀書時，是公認的科學奇才，兼修物理學和化學，師從徐光憲，以「中國的愛因斯坦」自勵。歷經「文革」磨難，研究物質結構的他，轉而探究中國的社會政治結構，並以布衣之身，組織研究活動，參謀高層決策，為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者之一。

（一）

《何維凌手稿》是他的遺著。寫於1989年。身在囚禁之中。他是為斡旋和平解決廣場危機遭遇秘密監禁的。恢復自由後，1991年他再赴墨西哥和美國，推動開放事業，因車禍而驟然辭世。他的離世，中斷了一切。《手稿》成了一個傳說。秦燕的序言〈何維凌生死書〉，講述了傳說中的《手稿》背後的往事，公開了少數朋友知道的秘密。最初告

訴我這個傳說的是王小強。爾後承小強的引見，有幸結識南懷瑾老師。老師常談到何維凌，談到他和老師的交往，多次說起：維凌啊，最後是從我這裡走的啊……並一再叮囑：他有一個手稿，你們要想辦法找到啊。

2014年8月23日，在北四環路的一個咖啡館，秦燕和我見到久違的王正德。9月13日，我們以一個協議方式，確定《手稿》出版權益歸何維凌家屬，並由他略述保存《手稿》的經過。正德先生將《手稿》交到我的手中時說：「曉京，我是交而不疑，疑而不交啊！」我不禁覺得通身燥熱，乃至汗毛倒豎……《手稿》寫在那個時代最普通的方格稿紙上，簡單地裝訂成14冊，並且編了頁碼，共509頁。真是天涯路斷，驀然得見！也真是緣分，時隔20餘年，我有幸再給維凌當助手，整理他的遺著。

(二)

何維凌是一位不論其言其行，皆不該被歷史所忘卻的人物。他留下這部《手稿》，以觀察者和參與者的雙重身份，記錄了他所親歷的1980年代中國改革的歷史。

《手稿》的寫作、託付、保存和問世過程，或可比之於中國史不絕書的先賢後學薪火相傳之事，其事或異，其道一也。若非有秦燕所述的託付和追索，若非王正德的忠誠保護，何維凌的生平事業和《手稿》或許會被時間所淹沒。所謂「觀其為友，可以觀其為人」，想來，還是他的為人，終於使《手稿》不至於被付之於水火。

何維凌其人，才氣過人而仁厚坦誠；憂國憂民「把吳鉤看了，欄杆拍遍」；他決絕粉飾，我行我素，敢作敢當，江湖義氣甚或浪漫狷狂，凡親歷交遊者盡人皆知。在他逝去20餘年之後，在萬丈紅塵淹沒一切信念理想之世，他居

然死去活來，現身說法。其思天下國家，其志變革社會，其文平直坦蕩，讀者或可憑此《手稿》想見其為人。至於《手稿》所立之言，所涉之史，所評人物、事件、思想的是非，且留待天下諸賢辯之。

《手稿》作者自嘲為「異端」，一直受某種勢力的監視和迫害，「文革」、改革，兩為階下囚。所謂「異端」者，或正在其「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」和變革社會的「自負使命」。「活著，是為了別人活得更好」。有此一念，一旦接觸社會現實，經歷理想幻滅，於是苦讀、探究、上下求索，並起而行之。他認定變革之途以改良為上，且「言微人輕，區區布衣，只有把握時機，抓住時機，利用時機以促改良，沒有大智大勇，不敢特立獨行，不敢奉獻犧牲的，就不要談改良」。何維凌關心政治，而非政客；以政治為「第一業餘愛好」，卻從未步入官場。金觀濤稱之為「中國的社會活動家」，鄧樸方說他「西方式的政治家」，他自己到美國後反而確認，他還是「中國的士大夫」。

《手稿》共分 25 個章節，主要是寫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：

我在囹圄中。我想了很久。我決定還是寫。寫幾段「發展組」的始末。不過僅從我的經歷回想，以我為「參照中心」，以我的觀感來寫。如果現在讓一諮，讓小強，讓淘淘，讓若冰或木生，以及別的王彥稱為「老八隊」的人來寫，一定會有不同的說法，不同的側重，甚至還會有不同的結論。沒關係。我自詡，我的角度是超「發展組」的角度——我想，我有資格這麼說。為什麼呢？從一開始我就是素有準備的：我既是策劃者，又是旁觀者。

這裡所提到的幾位，皆為當年「發展組」的領導小組成員。鄧英淘已於 2012 年英年早逝，在病苦中完成三本

書，呼喚「多數人的現代化」；^① 陳一諮 1989 年流亡海外，2014 年客死他鄉，留下了一部《陳一諮回憶錄》，^② 記錄他大半生的奮鬥經歷；王小強筆耕不綴，「煮字療飢」，繼續著自己的理論探索；^③ 張木生近年為「反思改革」而大聲疾呼，一句「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」，一句「回歸新民主主義」，一部《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》，竟轟動朝野。^④《手稿》記錄了陳一諮、何維凌、鄧英淘、王小強、張木生等為首的「發展組」，他們如何從民間匯聚起來，如何打開與中央決策層的「通天」對話之路，如何開科學的政策研究風氣之先。「發展組」和後來的「三所一會」，確是一段「牽動現實的歷史」，是任何人任何事件以及時間都無法使其湮滅的。^⑤

《手稿》同時記錄了作者與那個時代各方人物的交往，諸如朱嘉明、黃江南、王岐山、翁永曦「四簽名」，金觀濤、劉青峰夫婦和《走向未來》叢書的其他人物，唐欣、唐若昕、李湘魯、溫元凱、楊小凱，以及所謂非主流派的陳子明、王軍濤、胡平、姜洪等等，更記錄了他與老同學鄧樸方、胡德平的親密關係和往來切磋。他喜歡的一個「說法」叫做「時代精神的匯聚」，在「鄧胡趙萬改革」的年代，「時代精神」真實不虛地在一代人那裡「匯聚」起來，從而為改革開放的「黃金時代」鑄就基礎。

① 推薦參閱鄧英淘：《再造中國，走向未來》、《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》、《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》，（香港）大風出版社 2010、2011、2012。

② 推薦參閱陳一諮：《陳一諮回憶錄》，（香港）新世紀出版社 2013。

③ 推薦參閱王小強：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」系列之一、之二、之三、之四、之五，大風網站：strongwindhk.com。

④ 推薦參閱張木生：《超越左右說實話》、《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》，（香港）大風出版社 2007、2010。

⑤ 推薦參閱：《體改所與政策制定》，（香港）大風出版社 2008。

古人云，30年為一世。《手稿》還原的歷史，似乎已為「前世」。但是，「這段往事牽動的一切，其實並沒過去」，而《手稿》的問世，無疑有助於那段歷史的研究和反思。

(三)

整理《手稿》乃為一大幸事，亦為一大樂事。時光倒流，如同與故友聊天，如在 22 號樓何氏沙龍，或和他神侃，或聽他語錄，或領教他編「說法」，時而嚴肅凝神，時而聽他調侃，竟不禁開懷大笑。

古今中外，歷史往往是勝利者的專利，改篡者多多，故史實難存。以遺稿而成書者，有克勞塞維茨的《戰爭論》，因其妻瑪麗「完全按照原來的樣子分卷出版，不增減一字」而成經典。^⑥ 同樣是一個時代的參與者和思考者，一個研究強軍改革，一個講述社會變革，同是無私的心血遺作，何氏《手稿》是否成經典雖不敢妄議，至少為 1980 年代中國改革的第一級史料，故整理出版的原則也是：忠於原作，一字不改。在此原則下，我和楊瑩商定，為了便於讀者閱讀，只對年代和符號做了調整。《手稿》使用的年代，常常是「57 年」，「66 年」，「82 年」之類，加上了「19」兩個字，而成「1957 年」，「1966 年」，「1982 年」；《手稿》使用的標點，有時「，」「、」不分，照一般慣例作了訂正。

《手稿》中有些空白之處，按照作者寫在頁邊的提示，加入了他當時無法尋找原著、原文而想加以引證的內容，並註釋說明。對《手稿》所涉人物、書籍、文章和歷史

^⑥ 參見〔德〕克勞塞維茨著、軍事科學院譯：《戰爭論》第 1 卷，〈初版序〉，解放軍出版社 2015，第 8 頁。

事件，也加上了一些「編者註」，僅供參考。此外，為使《手稿》易於閱讀，編者摘出各章中的片言隻語，皆為原話，編了一個目錄；《手稿》原無名，《傳說中的何維凌手稿》亦為幾個朋友商量所定。特此說明。

《手稿》常用語「小青年」，編者是他當年所影響的「小青年」之一。他從「發展組」領導層「下野」的那兩年（1983~1984年），主編《現代社會學比較研究》叢書，編譯《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》人類學社會學詞條，撰寫《社會科學前沿的探索》，我是他的助手或合作者。我們曾三赴杭州，工作之餘，一邊爬山，一邊吟詩，甚或高歌一曲。他喜歡辛詞，邊走邊高聲吟詠：「七八個星天外，兩三點雨山前。舊時茅店社林邊，路轉溪橋忽見，」一邊高唱「走在鄉

村小路上」……對我而言，維凌是一個本色書生。他多次對我說「文學，乃英雄末路」，在做文字工作時又聲稱「魂兒回來了」；他反傳統而崇現代，而1986年從美國回國之際，曾對我大談南懷瑾的國學，且聲稱要再考中國傳統，令我印象深刻。《手稿》是其書生功底的明證。

《手稿》的打字，費去了不少時間。我的年輕同事幫助我完成了一部分打字工作，她們是李貝貝、郭天序、



1984年春在杭州秋瑾墓。我們在編輯《現代社會學比較研究》叢書，記得維凌故意站在高臺，好顯得比我高些。

瞿冬雲、高晗和我的女兒黃莎，感謝她們的真誠幫助。《手稿》有些字跡難以辨識，甚至要靠猜測，故難免誤讀，對此，編者已經作了反復校正，負全部的責任。

《手稿》的出版工作，使計劃中的《何維凌紀念集》及其《詩詞集》不得不推遲出版，在這裡向諸位寫就回憶文章的朋友致以誠摯的歉意。諸位的文字將在2016年何維凌去世25週年結集出版。

2014年12月19日，帶著整理中的部分《手稿》第一次踏上墨西哥的土地，那裡是這位「中國的社會活動家」為中國活動的最後一個地方，此行是一個祭奠。現在，《手稿》有幸由南懷瑾支持王小強創辦的「大風」出版，堪稱一段奇緣。

何維凌將其「我無憾」的生涯留在《手稿》中，刻在上面的是那個時代特有的精神存在。願讀者在閱讀其斑駁文字之際，能夠回望一下那一代人所走過的道路，度過一段思考那種「時代精神」的時光。或許，這是對這位先驅者最好的紀念。

2015年中秋節